

長江中游出土商代青銅器研究（二）

／萬全文

二、湘水流域成為重器之鄉

湖南境內出土的包括人面方鼎、四羊方尊在內的商代青銅器，迄今已達三〇〇餘件，是長江以南發現商代銅器最多的地區之一。這些青銅器的出土地點涉及二十多個縣、市，但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周圍，其中又以寧鄉黃材最為集中，青銅器絕大部分出自窖藏，且均屬商代晚期，尤以鑄造精美和形體高大厚重而引人注目。

考古發掘成果表明，殷人至遲在商代中期已渡江南下，活動於洞庭湖周圍地區。在湖南所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器也是在岳陽銅鼓山、石門皂市遺址的商代中期地層中出土的小件青銅兵器、工具，如鏃、削、泡等。湖南雖不及湖北有緊鄰中原地區的地理優勢，因近水樓台先得月，而率先鑄造了大批青銅器，卻是後來居上，在商代晚期鑄造了一批青銅精品。

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禮器，如鼎、甗、簋、尊、卣、方彝、壺、甬、觚、爵、觶等。

上述禮器器類既多，器形更繁，以鼎、尊

尤為突出。鼎有方鼎、分檔鼎、圓鼎之分，尊有方尊、圓尊、獸形尊之別。在獸形尊中，還有豕尊、象尊、牛尊等因仿效不同的動物形象而存在著造型上的區別，顯示了當時造型藝術的發展水平。

一九五九年在寧鄉黃材出土的人面紋方鼎高三八·五、口長二九·八、寬二三·七公分，重一二·八五公斤。體呈長方形，口卷沿，立耳，深腹。器身四面各浮雕一個人面：人臉較寬，雙耳肥大，顴骨高起，鼻梁尖削，雙唇緊閉突出，表情肅穆。從形象看有今天中國南方人的臉型特點，大概它就是今天中國南方人的寫真吧！有人認為，在商代青銅紋飾中，人面紋飾主要出現在商代後期，並且一般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半人半獸的特點。有的雖然為人面，但總要雕成半人半獸的樣子，或人面獸身，或頭上有長角，或口中有獠牙，這是由於商人崇拜鬼神的緣故。如此鼎在人耳上面有勾角狀物，人耳下有獸爪，應是古代文獻中「饕餮」的形象。還有的人認為古文獻中記載黃帝有四面，此器大概與「黃帝四面」的傳說



圖七 人面方鼎 湖南寧鄉出土

有關。但不管解釋有多少種，藝術總是來源於生活的。此器五官畢具，部位準確，應是根據當時人面鑄造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註七）器身四角及足上部有扉棱，使鼎顯得莊重。器內側中部近口處，鑄銘文「大禾」。「禾」字象形，是穀子抽穗時，穀穗沉甸甸下垂時的形象。此鼎可能是殷人為慶祝豐收而鑄造的，也可能是為祈求豐年而鑄造的禮器。

鼎的顏色翠綠，晶瑩如玉，是典型的「綠漆古」，經化學分析，其合金的成份為：銅百分之六十七、錫百分之一二·六六、鉛百分之一·九四，合金比例是恰當的。

以半浮雕的四個人面為主要紋飾的青銅器，不僅未見於其它器物，就是在當代金石著



圖八 象尊 湖南醴陵出土

作中也未見記載，是我國古代青銅器中極為罕見的一件珍品。（圖七）

一九七五年出土於醴陵獅形山的象尊，通高二六·五公分。此尊設計精巧，造型凝重雄渾，紋飾繁麗生動，是商代青銅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有關著錄如《商周彝器通考》曾著錄三件象尊，但都已流失國外，這是我國現存唯一的一件。

象尊惟妙惟肖，其鼻端作鳳首形，鳳冠上伏臥一虎。鼻中空，用作流，與腹腔相通。鼻下端有一倒懸的蟠虺，額上方飾渦狀的蟠虺紋。身部及四腿分別飾饕餮、虎、夔龍和鳳鳥等圖案，並均以雲雷為地。鑄造精工，形象生動。（圖八）

一九八一年出土於湘潭縣的豕尊，全長七二、通高四〇公分。豕尊造型逼真，其兩眼圓睜，平視前方，兩耳招風，長嘴上翹，微微張開，犬齒尖長。背上鬃毛豎起。四肢剛健，臀、腹部滾圓。被活靈活現地塑造成一個膘肥肉壯，孔武有力的野豬形象。其頭部飾陰刻的獸面紋，腹背為鱗甲紋，四肢和臀部為倒懸的夔紋，並以雲雷紋襯地。整個花紋精美峻深，但並不顯得繁縟。用豬的形象作為器形，在我國現已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中，絕無僅有，故彌足珍貴。（圖九）



圖九 豕尊 湖南湘潭出土

一九七七年出土於衡陽市郊的牛尊，通高七·四、長一九公分。尊成水牛形，由器蓋和器身兩部分組成。蓋的前端為牛頭，以牛口為流。蓋上站一虎，是為提手。軀體豐腴，四肢粗壯，顯得穩重渾厚。頸和背部飾有扉棱。全器以雲雷紋為地紋，並以粗線條組成夔龍和羊的圖案為主紋，紋飾精細繁縟。牛形尊小巧精緻，為僅見。（圖一〇）

一九三八年出土於寧鄉月山鋪的四羊方尊以其造型之雄奇，成為已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中的翹楚之作。該器高五八·三、口長五二·四



圖一〇 牛尊 湖南衡陽市出土



圖一一 四羊方尊 湖南寧鄉出土

公分，重三四·五公斤，是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器表漆黑發亮，是典型的「黑漆古」。全器自上至下，紋飾繁縟，自口沿以下至肩部，飾精美的蕉葉紋和夔龍紋帶；肩部四周有蟠龍一條，龍頭探出器表。自肩至足的四角，立雕四隻大卷角綿羊，綿羊嘴巴微張、眼睛溫忱，神態自在，其溫順寧靜的性格，被刻劃得淋漓盡致。羊的背部、胸部飾鱗紋，腿裝飾鳳鳥紋，圈足上飾夔紋、雲雷紋，線條剛勁光潔。此器工藝設計新奇，集線雕、浮雕、立雕於一器，把平面圖像和立體的雕塑結合起來，把動物形象和器皿的實用性有機地融為一體。如此讓世人傾倒的藝術精品，只有具備卓



圖一二 三羊紋鬲 湖南省博物館藏

越的寫實才能，並有著豐富想像力的天才雕塑藝術家，才可能創作出來。（圖一一）
四羊方尊以羊作為紋飾主題，《說文解字》：「羊，祥也。」這應是一件象徵吉祥的禮器。

在湖南出土的以動物形象作為裝飾的器物中，飾「羊」的器物是較多的，除四羊方尊外，還有：

一九六六年於華容出土三羊饕餮紋尊一件，肩飾有三個卷角羊頭；

一九五八年湖南省博物館收藏三羊紋鬲一件，其腹部飾三個羊頭，並各銜一足；（圖一二）

瀏陽曾出土青銅羊頭飾一件，重〇・五公斤，通高一三・寬一四・面部高六・六・寬八・五公分，面部爲一面具狀，器物造型莊重，紋飾精美，應是晚商重器上的裝飾附件等等。

這些飾「羊」的器物，各具特徵：其一，羊體半露，臉譜清晰，身蹄同塑，形象逼真，以四羊方尊爲代表。

其二，羊首造型大，頭部突出，呈浮雕狀，羊角彎曲向兩側面外伸，以青銅羊頭飾、三足饕餮紋尊爲代表。

其三，在鬲、鼎的袋足上陰刻羊面形紋飾，以三羊鬲爲代表。

「羊」飾也見於殷墟出土的同期青銅器，但與湖南青銅器羊飾的特徵差異十分明顯。（註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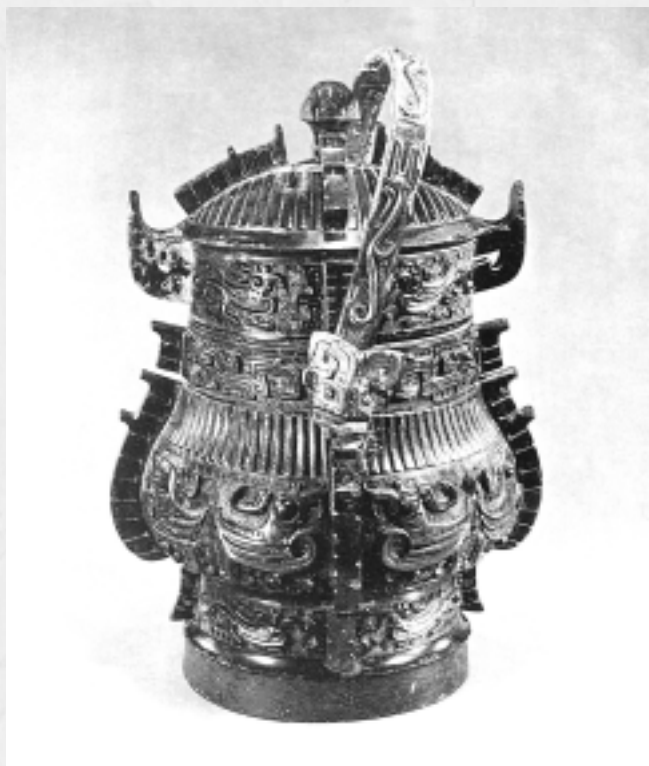
一九七〇年出土於寧鄉黃材的戈卣，高三七・七、口徑一五・四、腹徑二二公分，重一〇・七公斤。卣是酒器，《尚書·洛誥》記「鬯二卣」。《詩·大雅·江漢》記「鬯一卣」。所謂「鬯一卣」，就是香酒一壺。這件扁圓體斜肩寬垂腹縱向提梁式卣，提梁位於器身的正面和背面，與一般的提梁卣之提梁位於卣的兩側不同。卣的最寬處位於腹部中線以下，重心低，整器給人以穩重感。（圖一三）

卣的蓋、腹和圈足上均鑄有高

浮雕鳥紋，尤其是腹部的鳥紋，頭上有冠，鉤喙利爪，是右腳已向前邁出，左腳欲抬起的時刻，把一隻正欲捕食的猛禽形象刻劃得栩栩如生。器頸有浮雕式鳥頭獸紋一周，提梁上也飾夔龍紋，兩端鑄立雕式獸頭。

該器造型變化多端，紋飾華麗繁縟，浮雕式的鳳鳥，靜中寓動。而從蓋、腹一直到足的四條高大棱脊隨物賦形，更增加了器物的莊嚴肅穆感和沉穩而又神奇的氣氛。

卣身通體漆黑，光潔發亮，晶瑩如玉，是典型的「黑漆古」，提梁卻是翠綠色，爲「綠



圖一三 戈卣 湖南寧鄉出土

漆古」。這說明它們是分別鑄造的，因合金比例不同，故經過三千多年的氧化而形成了不同的顏色。

總之，該甬和上述其它幾件禮器一樣，在鑄造技術、裝飾工藝等方面都表現出高超的水平，絲毫不遜色於中原出土的同期青銅器。

湖南出土的另一類商代青銅器是樂器鏡。大銅鏡是我國南方商周青銅器中最具特色的一類，目前所見僅出土於兩湖、江浙、福建、江西和廣西。初步統計共四十三件，其中以湖南出土最多，達二十三日，另外，江西九件，湖北二件，安徽二件，浙江三件，廣東、廣西、福建、江蘇各一件。按時代分，商代二十八件，西周早期十五件。而湖南又以寧鄉爲主，占二十二件。

寧鄉的大銅鏡都是商代晚期的。這裡最早出土的一批是一九五九年在老糧倉師古寨山頂一土坑內發現的，共五件，出土時下層四件，兩件一排，上層一件，均口朝上。五件鏡的紋飾主紋都是以粗線陰紋組成獸面，其中兩件鼓部飾浮雕虎紋，兩件鼓部飾浮雕象紋。重五〇・七五—七〇・五公斤。

這裡出土的其它銅鏡分別爲：

一九七三年，黃材三廟地出土雲紋鏡一件，重七十九公斤，紋飾爲陰刻細線雲紋組成的獸面。



圖一四 銅鏡 湖南寧鄉出土

一九七四年，唐市鄉陳家灣出土獸面紋鏡一件，重八五・七五公斤。

一九七七年底，老糧倉北峰灘山腰出土銅鏡二件，其中一件重一〇五公斤，另一件重一五四公斤，紋飾主紋均爲粗線陽紋組成的大獸面。前者尚有一奇特之處，即在器內近口沿處鑄有四隻立雕臥虎，這四隻臥虎不鑄於器表，而鑄於隱蔽的器內，其目的可能不是爲了裝飾，而是要調節音的頻率。

一九八三年，在黃材月山鋪轉耳命山腰，發掘出大銅鏡一件，紋飾主紋爲粗線陽紋組成的大獸面，兩面陰部各飾一對相向而立的浮雕象紋。該鏡通高一〇三・五公分，重二二一・五公斤，爲目前所見的銅鏡之王。（圖一四）

一九九三年六月，老糧倉村民在老糧倉師古寨山腰挖山藥時，從一個土坑中挖出十件銅鏡，出土時分四層平置，下面每層三件，最上層一件。其中一件紋飾較特殊，其以浮雕的龍紋和牛頭紋組成大獸面，獸面左右和下方有十三個圓餅形乳突，浮雕粗線上又陰刻細線雲紋，花紋繁複精美，在商代銅鏡中尚屬首見。重二八·五公斤。另外九件形制相同，紋飾以陰刻細線雲紋為地紋，兩面各有乳突十八個。九件鏡大小有序，最大的重三十一公斤，最小者僅九·五公斤，應為一組編鏡。

同年八月，在同一地點另出土銅鏡二件，紋飾主紋均為粗線陽紋組成的大獸面，一件重一〇二公斤，另一件稍小。

以上二十二件寧鄉出土的銅鏡，除二件出土於黃材，一件出土於唐市外，其餘十九件均出自老糧倉。（註九）

寧鄉出土的大銅鏡，形體雄偉厚重，紋飾精美。這種大型的仰擊樂器，使用時口部朝上，底柄插入木座中，擊之聲音宏亮。

銅鏡是一種軍樂器，《周禮·地官·鼓人》記：「以金鏡止鼓」。在軍隊退卻時，用擊鏡來指示停止進攻的鼓聲，也就是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說的「鳴金收兵」。或者類似銅鼓，「擊鼓山頂，足以號召部眾，指揮軍陣。」但用於軍旅的鏡，一般較小，而寧鄉出土的大銅鏡至大者重達二二五公斤，用於軍旅顯然是不方便的，因此大銅鏡在當時多用於盛大的祭祀。

湖南出土的上述兩大類商代銅器大部分出

自窖藏，窖藏多位於山頂、山坡、山麓、河岸湖邊或台地上。殷人是特別迷信鬼神的，重視對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因而祭祀繁多，甲骨文中大量的關於各種祭祀的記載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殷人所祀對象除祖先外，還有山川、星辰、風雨、土神等，每次祭祀都要用大量的犧牲和禮樂器，每次祭祀完畢之後，這些禮樂器可能即被就地掩埋起來，從而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

湖南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銅器至少有一部分是為湖南本地所鑄造的。在石門皂市發掘出土的鑄銅遺跡包括銅渣、煉銅爐等，表明當地在商代中期已開始鑄造銅器，並且顯然是接受了中原商文化影響的結果。

上文曾提到殷人以盤龍城為跳板，深入到更南的地區如湖南、江西等地。而隨著盤龍城的衰落，文明中心有可能轉移到其它地方，一個可能的地點是江漢平原西南側的江陵、沙市一帶，另一個地點則在洞庭湖平原東南側的以寧鄉黃材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帶。（註十）文明中心的轉移，意味著不僅有殷人的南下，而且還帶來了先進的青銅鑄造技術。因此，這裡出現大量的商代晚期青銅器是不足為怪的。

湖南出土的青銅禮器因為殷人的南下而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原商文化的烙印，與中原同期青銅器有著相同的風格，這也是有人認為這裡出土的禮器是來自於中原的原因。

形制：一些器物如尊、簋、卣、鼎、觚、爵、觶等與中原同期同類器形制完全相同。

紋飾：禮器上盛行獸面紋、夔紋等，尤其以主紋上陰刻雲紋並使用雲雷紋為地的「三層花」為最具特色，且盛行扉棱，浮雕的獸面等裝飾手法。這些也與中原商器一致。

銘文：部分禮器上有族徽文字和銘文。族徽文字如「戈」、戈、旅等都是中原地區常見的。又如銘文「作寶尊彝」，無論內容、格式、書體都與中原地區的一致。族徽是族的標誌，如果說鑄造技術、器形、紋飾等尚可從其它地區、其它文化中學習借鑒，那麼族徽之類是不可能直接加以移植的。由此可表明該地區出土的青銅禮器與中原商文化淵源之深。

銘「戈」的器物在湖南商器中已發現六件，如寧鄉的癸卣、己鼎，湘潭的觶和父乙爵，益陽的父乙壺及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父丁爵。「戈」是商代的望族，銘「戈」字族徽的銅器至少在百件以上。據統計，有出土地點者十八件器，河南九器，以安陽殷墟出土者居多，可證「戈」族是殷人無疑。

「戈」也是商代望族，湖南發現銘「戈」的商器有三件，即寧鄉出土的卣，湘潭的觶，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庚父戈」鼎。其它各地發現的銘「戈」字單體族徽的銅器在百件以上，根據對有出土地點的十九件銅器分析，或認為「戈」族的原住地應該以陝西涇陽和河南安陽兩地的可能性較大。」（註一一）

湖南出土多件銘「戈」、戈等族徽的銅器，表明這兩個氏族的一部分在商代後期已遷至湖南境內，他們是隨武丁征荊蠻南下而未返，還是

其它原因所致，不得而知。

鑄造技術：各類禮器普遍地顯示出高水平的鑄造技術，如出土於湖南寧鄉的四羊方尊，羊角上面有分範鑄痕，陶範吻合嚴密，彎曲弧度雖大，表面精度甚高，其鑄造工藝已達到當時的先進水平了。

青銅器的風格主要體現在器物的形制、紋飾、銘文及鑄造技術等各個方面，上述情況表明，湖南出土的青銅禮器與中原商器有著廣泛的一致性，有人因此認為這裡的禮器是南下的殷人從中原帶來的。

湖南出土的商代禮器也還是有一些自身特徵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獨特的造型風格。或體大而重，如湘鄉出土的爵，高三二·八公分。中原婦好墓出土的所謂「空前大爵」，也只高三十公分。華容出土的犧首獸面紋尊，高達七二·四公分，也比中原的尊高大。或奇巧而秀麗，一部分器物以立體的動物形象作為造型，如象尊、牛尊、鴛卣等，極具寫實傾向，與中原出土的鳥尊、兕觥等莊嚴古樸而圖案化意味頗濃的同類器相比，顯得自然清新。相傳出於湖南的「虎食人卣」，構思奇特，造型詭異。這種「人獸母題」似有巫術寓意，有待進一步研究。

其二，裝飾手法別具一格。如寧鄉出土的人面紋方鼎，四壁各以一個浮雕的人面作為主要裝飾，在青銅器中實屬僅見。以動物作為裝飾，較普遍的有兩種，一種為虎，一種為羊。羊飾如前述。虎飾如「虎食人卣」，全器作虎

形。虎紋大鏡的鼓部裝飾乃至控制內腔音量的物體，也是虎；象尊的鼻、身軀和足上，裝飾有十三隻虎；牛尊蓋上的提手也是虎；至於一件略顯輕薄的大鉞，也飾有令人賞心悅目的虎紋，與中原習見的那種令人觸目驚心的凶猛虎紋的大鉞有明顯不同的風格。虎紋、羊飾在這裡的商器上盛行，或許是與這裡的生態環境有關。當初這裡的自然條件適宜於虎、象之類的動物生存，而羊已成家畜，土著居民與之共處，或受其害，或得其益，而無不熟知其形象，深諳其習性，這就刺激了他們摹寫禽獸形象的慾望。再加上出於巫術的創作動機，鑄造出如此風格獨具的青銅器，應是不足為怪的。或以為羊飾、虎飾與圖騰有關，這也是可能的，但無從考定。

其三，合金配比有別。湖南所出商器有相當一部分不是漆黑發亮的「黑漆古」，便是翠綠如玉的「綠漆古」。這除與湖南的酸性土壤有關外，還與合金配比有關。化驗結果顯示，湖南商器含錫、鉛量較中原為高，含錫、鉛較多，既可降低銅的熔點，又可增強銅器硬度和光澤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同位素源X射線熒光儀對華容的圓尊、桃源的方彝蓋、石門的提梁卣、「父乙」簋、湘鄉的大爵、寧鄉的銅斧、銅削、銅鏃等進行檢測，都含有錒。而中原出土的青銅器大都不含錒。（註一二）這可能是由於湖南的錒礦資源極其豐富，而在鑄銅加入錒、鉛成份時混入了錒的緣故。（註一三）

根據以上的情況予以判斷，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當商、戈等氏族的一部分南下時，帶來了部分銘有族徽的銅器，與此同時還帶來了先進的鑄銅技術，與土著相結合，利用當地豐富的銅、錒原料而鑄造了大批的青銅器，並理所當然地融入了濃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

湖南出土的另一類商代青銅器大銅鏡無疑是在本地鑄造的，大銅鏡有著非常典型的地方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形制上，湖南所出大銅鏡高大厚重，最高達一〇三公分，最重達二二一·五公斤，而河南安陽和溫縣所出同期的銅鏡最大的高僅二十一公分，小的高僅七·七公分。南方銅鏡大多數甬上有旋，而北方的鏡均無旋。

其二，紋飾上，湖南大銅鏡紋飾繁縟，一度流行以粗線條組成的獸面紋為主紋，後以雲紋為主紋，這在北方鏡中未見，其它器物上也罕見這種作風。湖南大銅鏡滿身紋飾，而中原鏡的紋飾極其簡單，顯然有別。

其三，冶鑄上，南方大鏡有用純銅鑄製的，如一件象紋鏡含銅量高達百分之九八·二二，另一件乳釘鏡含銅量也高達百分之九二·七八，屬純銅型。使用純銅鑄鏡或許是處於冶鑄技術初級階段的反映。《考工記》說：「六分其金而錒居其一，謂之鐘鼎之齊。」也就是說青銅樂器中，錒的比例以百分之十六·五為宜。因此，大銅鏡當中，雖不乏數百斤重的龐然大物，但冶鑄水平並不高。在中原地區似未見用純銅鑄造的鏡。

其四，出土情況方面，湖南大鏡多出自窖藏，可能為祭祀後的遺物，而中原銅鏡多出自墓葬，且多三、五件一組成套出土，說明其用途不同。湖南大鏡要植於座上仰擊，而中原銅鏡則是要一木柄手執而鳴，故二者擊法也不同。

其五，演變情況方面，以湖南所出銅鏡為代表的南方大鏡發展演變連貫清楚，其演變線索為：主紋圓凸的獸面紋鏡↓主紋平扁上有雲紋的獸面紋鏡↓雲紋鏡↓乳釘紋鏡↓有枚鏡↓甬鐘。而中原地區的小鏡看不出其自身的演變序列，到西周早期已基本絕跡。（註一四）

大銅鏡的族屬應是越人，一方面大銅鏡的出土地點主要分布在長江中下游地區，這裡為百越聚居區；另一方面，長江中下游銅礦帶的早期主人是越人，他們是擁有者兼採冶者，只有在擁有豐裕的銅料的情況下，才可能鑄造含銅量達百分之九八·二二的大型銅鏡。越人在吸取中原地區先進的青銅鑄造技術的基礎上，就地鑄造了一批在商周青銅器中獨具特色的器物。

總之，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造型奇特，紋飾秀麗，氣魄雄偉，有凝重渾厚的風格，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

（待續）

註釋：

- 七、傅舉有〈商代青銅重器之鄉〉，《故宮文物月刊》一九九三年二期。
- 八、汪松桂〈試談湖南晚商青銅器上的「羊」飾〉，《江西文物》一九九一年三期。
- 九、黃綱正〈寧鄉出土的商代大銅鏡及有關問題〉，《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十、劉彬彬〈略論長江中游夏商時期的文明〉，《長江文化論集》，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
- 一一、鄧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 一二、北京鋼鐵學院：《中國冶金簡史》，科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 一三、高至喜：〈「商文化不過長江」辨——從考古發現看湖南的商文化〉，《求索》一九八一年二期。
- 一四、高至喜〈中國南方出土商周銅鏡概論〉，《湖南考古輯刊》第二集，一九八四年九月。

